

· 中国刻书史 ·

满文坊刻图书述论

黄润华

1644年5月,随着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并迅速向各地推进,满语文也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于社会的需要,满文刻书业应运而生。满文刻本可分为官方刻本和民间刻本两种,官方刻本以皇家刻本为主,另外还有各地驻防和官署的刻本,这部分参见拙作《满文官刻图书述论》(《文献》1996.4)本文拟对民间刻本探讨一下其来龙去脉。

民间刻本主要是指书坊和刻字铺刻印的书籍,另有一些私人的家刻本也属此列。清代的书坊虽遍及全国,并形成了北京、苏州、广州、佛山等几个刊印中心,但就满文图书而言,其刊印中心仅在北京一处。

北京作为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明代北京的刻书业就很兴盛,书市多集中在大明门(今前门)之北之右及拱宸门之西。到清初,则转移到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但是现存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满文坊刻本却不是北京刻的,而是南京(金陵)听松楼刊印的《诗经》,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4),共六卷六册,满汉合璧,版框高22.8CM,宽14.6CM,每叶上半面是满文,九行,版框高13CM,下半面是汉文,也是九行,版框高9.8CM。扉页有牌记“新刻满汉字诗经”,满汉文分别左右,中间署“听松楼藏板”,首页为满文御制序。中缝汉字题“满汉诗经”。象这样满汉文分别上下刻印的图书仅见于清初,以后都是间行刻

印。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一种刻本，满汉合璧，全书两册，内容都是格言。每叶两行，左为满文，右为汉文。第一册每行三字，第二册为四字。三字的如：“仁为宅，义为路，忠为首，孝为先，俭为常，智为根”等，四字的如“动不可躁，静不可怠，非不可饰，过不可文，群不可党，量不可狭”等。这部书无书名页，亦无刻书的年款，在编辑《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时，将此书拟名为《格言》，根据刻书的风格判断是顺治年间的坊刻本。此书的首页有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在1940年的一段题词：“福克斯博士言，此书现在所传北京北堂一本耳，别处绝无，以为甚稀珍，购价仅不过三元也，可言余辈穷生天与之福。昭和十五年三月，春秋志”由此可知此书当年是今西春秋花三元钱收藏的，并经德国满学家福克斯博士看过，认为此书别处绝无，因而十分珍贵。确实，到目前为止，此书尚未见过第二部。

顺治年间的坊刻本仅此二见，而刻印满文书的店铺仅知南京听松楼一家。

康熙年间，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多了起来，除了南京的听松楼仍在刻印外，北京先后出现了十家刊印满文书的书坊，它们是宛羽斋、秘书阁、玉树堂、尚德堂、寄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等。宛羽斋在前门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印了《大清全书》，天绘阁、尊古堂都在西河沿，清初这一带是书籍的刊印中心。南京的听松楼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印了《清书全集》，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了《同文广汇全书》，以后再未见其有满文书问世。康熙年间另一家刻满文书较多的书坊是天绘阁，它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了《同文广汇全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了《满汉类书全集》，另有满文本《孙吴子兵法》，未有明确年款。其余几家书坊各只有一种刊印。据缪荃孙说天绘阁主人为刘氏，后改号为聚珍堂，位置在

隆福寺，刘氏的天绘阁不知是否就是康熙年间的天绘阁，只不过康熙年间的天绘阁在西河沿。

到雍正年间，北京刊印满文图书知名的书坊达 13 家，它们是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其中老二酉堂是个老字号，在琉璃厂，李文藻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它，并说：“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到清末方歇业。这家书铺在雍正十一年（1733）刻了《满汉全字十二头》一书，这是一部学习满文的基础书，到乾隆年间老二酉还刻过满文书，后未见再有满文书问世。三槐堂是出版满文书较多的一家书坊，从雍正到光绪，绵延近 200 年，以三槐堂的名义刊印图书持续不绝，但是现有关于三槐堂的文献记载是从道光年间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资料付诸阙如。雍乾间的三槐堂是否一直承袭到道光年间，目前尚无资料证明。

到乾隆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需求增大，满文的坊刻本也有所增加。乾隆时期，北京形成了以琉璃厂为中心的新的刻书、售书市场，而在此之前，书坊大多在前门外，如打磨厂，西河沿等，城内如骑河楼等。琉璃厂因明代在此制造琉璃瓦而得名，清初还不繁荣，到乾隆年间，方为市肆。当时正月灯市从灯市口移到这里，每到正月十五，搭棚悬灯，百戏杂陈，锣鼓喧天，同时出售书籍、字画、古玩、食品等，这就是有名的厂甸集市之始。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后，文士云集。当时参与修书的学者大多寓居宣南，他们上午进四库馆编书，中午在馆内用过茶饭后归寓，下午就到琉璃厂访书。在四库馆内校阅图书时将需要参考的书目一一列出，再到琉璃厂书肆去查找。现存最早的一篇记载琉璃厂书坊情况的文献是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写的《琉璃厂书肆记》，其中记录了数十家出售书籍、古玩的店肆。其中的文锦堂、二酉堂在乾隆二十年（1755）刻过

《四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音汉清文鉴》。英华堂徐氏书坊乾隆十一年（1746）刻了《一学三贯清文鉴》。乾隆六十年中，前后有十多家书坊刻过满文图书，留有堂号的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文瑞堂、永魁斋、永魁堂、秋芳堂、静宜斋等，主要集中在乾隆四十年前。乾隆四十年后只有双峰阁、三槐堂、文盛堂等几家。

嘉庆年间满文坊刻本很少，有堂名的仅见嘉庆二十一年（1816）文盛堂重刻的《六部成语》。文盛堂是一家老字号，早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就刻印过满汉合璧《西厢记》，乾隆六十年（1795）又刻过《六部成语》。

道光年间刻印满文书的店铺依然不多，留有堂名的有炳蔚堂朱氏书坊、五云堂、三槐堂和聚珍堂等。前面说过，三槐堂的堂号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雍正二年（1724）刊印过满汉合璧《圣谕广训》，雍正八年（1730）刻满汉合璧《清文启蒙》，后又刻《读史论略》。乾隆年间又刻有《四书》（乾隆二十年 1755）、《清汉对音字式》（乾隆三十七年 1772）、《三字经注解》（乾隆六十年 1795）。

道光年间的三槐堂在隆福寺对门，其于道光十年（1830）刻的《圆音正考》一书，首有满洲乌扎拉氏文通序称：“庚寅春，三槐堂书坊龚氏宜古，持《圆音正考》一册，欲付梓，请序于余，兼请校正其讹”云云。可见道光初年，三槐堂主人为龚姓。在此之前，道光二年（1822）三槐堂已刻过《吏治辑要》，三年又予重刻。咸丰、光绪年间，三槐堂不断有满文书问世，是满文刻书时间较长数量较多的书坊。

另一家刊印满文书较多的书肆是聚珍堂。聚珍堂亦在隆福寺，据记载其前身为天绘阁，其历史可追溯到康熙年间。以聚珍堂名义刊印的满文书最早可见的是乾隆年间的满汉合璧《四书》，道光二十年（1840）刻满汉合璧《音韵逢源》。这类历史悠久的老字号

尽管招牌不变，但主人屡易。光绪二年（1876）聚珍堂主人为刘英烈，原名王盛，字魁式，河北束鹿人。这爿书铺一直经营了五十多年。聚珍堂在光绪年间满文图书刻印活动是比较活跃的一家。

光绪年间，满文书刊印事业似乎出现了“回光返照”，除三槐堂、聚珍堂两家老字号外，还有柳荫山房、尚友堂书坊、文渊堂、文宝堂、名德堂、护国寺肖氏等数家。这期间，石印技术传入我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京石印馆刻了满汉蒙三体合璧《分类汉语入门》。这一时期在外地如湖北荆州积古斋、盛京西彩盛刻书铺也都有满文书刊印。外地满文书坊刻本仅见于顺治年间的南京听松楼和清末的荆州、盛京，中间几百年竟一无所见。

有确切纪年的最晚的满文书是宣统二年（1910）由湖北荆防广化善堂刻印的《朱文公家训》。作为满文图书刻印中心的北京，到清末，印刷技术已改进为石印，最后的满文图书是宣统元年石印本《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从内容上看已出现“强国之道，以兵为本”“陆有炮台，海有战舰”这些具有“新学”的内容了。这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同时也标志着刊印满文图书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坊刻图书与官刻图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因为它是将书籍作为商品，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而刊行的。围绕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坊刻满文图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普及读物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为国策，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统治、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从顺治帝开始，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教化。

清初顺治帝发布“六谕”，康熙帝推衍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帝登基，标榜自己“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将“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

(1724)内府刊印，并敕令将此书刊印至直省州县，各地学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讲，使之家谕户晓。到道光三十年(1850)，清宣宗又对《圣谕广训》作了一番解释，并敕令作为书院家塾的必读书。既然统治者如此看重，所以《圣谕广训》自雍正年开始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坊刻本刊行，成为版本繁多，印量颇大的畅销书。

大约在嘉庆年间，出现了一部《吏治辑要》，由铁岭高鹗编著。此书将有关吏治的著述辑录在一起，对官员的政治标准、个人素质、法纪要求等都有论述，对官员从政颇有帮助。此书被在沈阳的内务府附生通瑞译成满文，蒙古领队大臣明叙作了校正，译本被通瑞的朋友、满洲二等侍卫梦芾见到后大为赞赏，认为“吾三韩当务之急，莫此若也。不必赘言适用而用无不适，不必赘言济用而用无不济者，正谓此耳，何必他求哉！”于是将此书付梓。道光二年(1822)由北京的三槐堂出版发行，当年便销售一空，翌年又重刻，咸丰七年(1857)，此书被译成蒙文，到光绪年间，三槐堂、聚珍堂又同时刊印，可见此书在清末广受欢迎的程度。

二 四书五经

清袭明制，以科举取士，汉族士子按省举行考试，同时设八旗官学，从顺治八年(1651)开始，举行乡试、会试。在官学学习和考试的内容均是儒家经典，因此四书五经的翻译与出版就成为很大的社会需求。现在最早的坊刻本便是顺治十一年(1654)听松楼刻印的《诗经》。四书是儒家的基本经典，因此很早便译成了满文，由坊间刊行。现在能看到最早的坊刻本是康熙三十年(1691)玉树堂的满汉合璧《四书》刊本。乾隆帝登基后，对四书译本重新作了一次厘定，从乾隆二十年后直至光绪年间坊间大量刊印，象三槐堂、二酉堂、聚珍堂、保翠斋、宝名堂、名贵堂、文光堂、圣经博古堂等都有印本，可以说四书满汉合璧本在清代也是最畅销的坊刻书之一。《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的印量也较大。

三 启蒙读物

《三字经》、《千字文》是汉族通行的启蒙读物，流传长远。满族入关后也接受了这些读物，雍正二年（1724）惟德、陶格将《三字经》译成满文，后经乾隆到道光，近百年中一再刊印，道光十二年（1832）还译成蒙文，《千字文》也有三槐堂、文萃堂、敬修堂等书坊先后刊印过。

四 文学作品

属于文学作品的坊刻本品种不多，但从译文和书品来看都属上乘之作。如《西厢记》有两个译本，一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寄畅斋刻印的《精译六才子词》，由刘顺译校。此书只译了《西厢记》中的曲文部分，每页汉文列上，满文列下。两年后出现了一个全译本，由文盛堂刊印，满汉合璧，每叶十二行，可惜未著译者姓名。

《翻译词联诗赋》是文英堂刊印的，四卷、满汉合璧，刊印时间不详，从风格上看较晚。首卷为词，卷二为楹联，卷三是诗，卷四为赋，此书流传不多。

小说有《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成书于康熙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流传，到道光年间由盛京工部主事札克丹选书中129篇故事，译成满文，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印行后颇受欢迎，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北京二酉斋再次刷印，所用书板即是道光年间初刻时的原板。

《三国演义》是清代翻译最早的一部小说，早在关外时期，已由满族的文圣达海开始翻译满文，可惜翻译未竟，达海英年早逝。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袞又令满族文臣重加翻译，顺治七年（1650）译毕由内府刊印，全部为满文。《三国演义》满文本问世后，又出现了一种满汉合璧本，共四十八册，框高21.5CM，宽15.5CM，每半叶满汉文各七行，满文与顺治译本同，汉文列在满文之右。从汉文中“玄”、“贞”均已避讳，而“弘”字未避这一

情况推断，此种满汉合璧本应是雍正年间所刻，从其刻工、纸张及装帧等情况看，应是民间坊刻本，但是未有刊印书肆的牌记和其他著录内容。

五 满语文专业类图书

清代把提倡清语骑射作为国策，乾隆皇帝认为“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把能否坚持清语骑射，能否保持满洲旧俗看成是有关清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顺治朝开始即开设八旗官学，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并开设翻译科，使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后能得到好的出身，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清代对满语文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始终未有间断。从官方来看，康熙朝编了《御制清文鉴》、《满蒙文鉴》，乾隆朝更有《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未刊本）等巨著推出，民间也出现了相当一批满语文的研究著作和工具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京都宛羽斋刊印了《大清全书》，这是有明确年款的最早的一部满语文专门研究著作，它包括了满语的语音、语法和满汉对照辞书。作者是个汉族人，姓沈名启亮，字弘照，娄东人。作者处于清初时代，在满洲行伍中征战多年，学会了满语，并对此十分喜爱。后到京师在镶黄旗下设馆课徒，有机会就教于一些满族文儒，对满语的十二字头和一些基本语法第一次作了研究和总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了一部 12000 字左右的满汉对照辞书。满语学家李德启先生称此书保留了清初一些满语词汇，为后来辞书中所无，对研究满语发展历史具有独特的价值。此书出版三十年后，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北京三义堂重新刊印。

雍正二年（1724）李延基编著了《清文汇书》。这是一部满汉对照词书，比《御制清文鉴》还多收 2000 多个词汇，是清代版本最多、流行最广的词书之一，这部书的影响也很大，乾隆五十一

年(1786)又有《清文补汇》问世,由宗室宜兴编著,共八卷。体例与《清文汇书》同,又补充词条7900余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志宽、志培将两种词书合并名《清文总汇》。

雍正八年(1730)舞格编著了一部满文教科书,名《清文启蒙》,满汉合璧,四卷,以汉文解释满文语法,从语音十二字头开始到满语套语、虚字等,内容全面,在清代流行较广。乾隆年间有关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刊印更多,较有影响的有《清文典要》(乾隆三年1738)《六部成语》(乾隆七年1742)《翻译类编》(乾隆十四年1749)、《音汉清文鉴》(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话问答四十条》(乾隆二十三年1758)等。清代后期出现的《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十一年1885)、《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二十年1894)《字法举一歌》(光绪十一年1885)《初学必读》(光绪十六年1890)等反映了晚清时期满语研究的新水平。

综观有清一代满文坊刻本图书,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 书肆自己刻版自己发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书肆往往在牌记上只注明堂号,或写明某家藏板,有的还注明书肆地址。如《御制翻译书经》就写明“京都琉璃厂瑞锦堂 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合璧聊斋》写明“光绪丁未年琉璃厂路南二酉斋藏板”,《清文汇书》写明“此书在打磨厂中间东中和堂书坊发行 乾隆十六年新刊”,有的书则盖章说明,如乾隆二年刻的《满汉经文成语》扉页盖有一章,上钤文字“京都徐铺住顺城门外琉璃厂英华堂藏板”。

二 多家书肆同板刊印。有的书虽然同时有几家书肆刊印,但仔细一看,可以发现用的是同一板,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一些满语文专业图书上,如宏文阁与文瑞堂在雍正十三年(1735)同时推出《音汉清文鉴》,这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辞书。又如《翻译类编》,这是一部满汉分类词典,共收约3000个词汇,在乾隆十四年(1745)由文渊堂、鸿远堂、永魁斋同时刊印,其中鸿远堂与

永魁斋用的是同一刻版。这种现象反映了在当时的刻书业中已有一定规模的联手经营，尽管在市场占有额上受一定影响，但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降低成本，出版的又是发行量较大的畅销书，总体还是合算的。

三 在一些图书的牌记上标明“翻印必究”，如雍正十三年（1735）的《音汉清文鉴》、乾隆十一年（1746）的《一学三贯清文鉴》等，这种情况明代已有，到清代，书肆的版权意识更加强化，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在牌记上标明对盗版有追究的权利。

四 有清一代刊印满文图书的书肆虽比较多，但就单个书肆而言，除少数几个如三槐堂、聚珍堂等以外，出书种数并不多，有的只有一两种，这说明刊印满文书在这些书刊出版业中只占一个附属地位，更没有形成专业的满文图书出版书坊。

五 从内容看，坊刻本与官刻本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官刻本中常见的几类书如政书类、法律类及“御制”、“敕纂”类书籍及佛经等坊刻本几乎从不涉及，在儒家经典、满语文专业等类图书中，坊刻本与官刻本也有比较明显的分工。儒家经典类只刊印“四书”这类儒家的最基本最通俗的读物，其直接为科举服务的目的性十分明显。另一类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通俗读物，如《醒世要言》、《圣谕广训》、《劝善要言》等，虽有官刻本，坊刻本也很多，这里除了统治者的提倡外，也不难看出书商对利润的追求。

在有关满语文学学习和研究的图书方面，清代官方编纂、刊印了很多作品，如《清文鉴》、《满蒙文鉴》、《增订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等。这些都是满文研究的权威性工具书，在学术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水平。这些图书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因而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书的坊刻本。可见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坊是不能翻刻这些“御制”图书的，这方面是官方的专利。坊间刊印的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大多是私

人的专著，有些受欢迎的著作在各朝不断出版，如李延基编著的《清文汇书》，这是一部满汉对照的词书，从康熙年间京都四合堂首刻以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约有六、七家书肆刻板发行，是清代刻本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工具书，到乾隆年间还出现了续编《清文补汇》，乾嘉两朝直到光绪年间都有不同刻本问世。其他如《清语启蒙》、《六部成语》等都是清代坊间一再刻印的学习满文的专业书。

六 清代满文坊刻本图书，绝大部分是满汉合璧，少数是满蒙汉三体合璧，全部为满文的极少。从写作方式上看，主要是两种，一是翻译，即是将汉文著作翻译成满文，其中大多为四书五经类的儒家经典，也有一少部分文学作品。二是创作，这部分主要是学习满语文的专业图书，包括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和辞书等。翻译作品将汉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些著作译成满文，使满族便于了解接受。这些汉文著作大多具有通俗性、普及性的特点，译成满文后，阅读、接受的层面也更宽广。尽管书坊是出于赢利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七，清代满文坊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是满文研究著作比较丰富，比较全面。在清廷提倡清文政策的推动下，有清一代，从官方到民间对满语文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康熙、乾隆两朝在皇帝的倡导、过问下，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学者编纂了一批重要的满文学习工具书，这些“御制”图书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对学习、研究满语文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更多的满文研究成果是通过私人来完成的，这些人有满族、蒙族也有汉族，有官员也有未登仕途的文人，从清初顺康朝到清末的光绪朝，近三百年人才辈出，由于他们对满语文的热爱、探求、研究，满语文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硕果累累。众多的作品通过民间书坊刊印成书，流传至今。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满语文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轨迹，反映了清代近三百年满语文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研究水平，对今天满语

文的学习研究和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满文坊刻本功不可没。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性或全国性政权，如辽、金、西夏、元等诸朝，都用本民族的文字刊印了很多书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未留存下来。如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创契丹大字，后又创契丹小字，用契丹字翻译、刊印了一些汉籍，如《白氏讽谏集》、《五代史》、《贞观政要》等，但都散失了。金代创女真字，自大定四年（1164）开始译书，有《论语》、《孟子》、《易经》、《尚书》等十余种，也是一种都未留下。十一世纪的西夏王朝用西夏文撰写了很多官私著作，还翻译了很多汉文图书和佛教经典，这些文献中的一少部分保存至今，是民族文字典籍遗存较多的一种。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从忽必烈开始，建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元代用蒙古文撰写、翻译过不少书籍和佛经，这些典籍大多出自天历二年（1329）设置的艺文监，流传至今只有蒙汉合璧的《孝经》和蒙文《入菩提行论疏》残卷，其余都散失了。

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在前期积极学习、吸收汉族的传统文化，使自身很快适应并融合到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去，使满族的历史文化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表现在典籍方面，除了刊印大量官刻满文图书外，在民间也出版了相当规模的满文印本，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流布之广，是前所没有的。满文坊刻本图书的大量出现，对满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综观中国历史，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能保留下来这么丰富的民族文字图籍，是绝无仅有的。这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中国印刷出版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也是历史留赠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珍贵遗产。

清代满文图书坊刻本知见录

朝代	书坊	刊印书名
顺治十一年 (1654)	金陵听松楼	诗经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京都宛羽斋	大清全书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秘书阁	满汉同文全书
康熙三十年 (1691)	玉树堂	四书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天绘阁	同文广汇全书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尚德堂	文广汇全书
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听松楼	清书全集
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听松楼	同文广汇全书
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寄畅斋	精译六才子书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三义堂	大清全书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四合堂	清文汇书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天绘阁	孙吴子兵法
雍正二年 (1724)		清文汇书
雍正二年 (1724)	鸣皋阁	凝华集
雍正五年 (1727)	敬修堂	满汉字训旨十则
雍正八年 (1750)	三槐堂	清文启蒙
雍正八年 (1750)	中和堂	清文启蒙
雍正八年 (1750)	宏文阁	清文启蒙
雍正十年 (1732)	墨华堂	性理
雍正十年 (1732)	鸿远堂	四书字解
雍正十一年 (1733)	京都老二酉	满汉全字十二头
雍正十一年 (1733)	宏文阁	满汉全字十二头
雍正十一年 (1733)	精一斋	书经

雍正十三年 (1735)	文瑞堂	音汉清文鉴
雍正十三年 (1735)	宏文阁	音汉清文鉴
雍正十三年 (1735)	英华堂	音汉清文鉴
雍正十三年 (1735)	二槐堂	三字经注
雍正十三年 (1735)	三槐堂	读史伦略
乾隆二年 (1737)	英华堂	经文成语
乾隆二年 (1737)	文瑞堂	分类汉语入门
乾隆三年 (1738)	文锦、二酉堂合刻	书经
乾隆三年 (1738)	永魁斋	清文典要
乾隆三年 (1738)	秋芳堂	清文典要
乾隆三年 (1738)	文锦、二酉堂合刻	清文典要
乾隆七年 (1742)	永魁堂	六部成语
乾隆十一年 (1746)	静宜斋	一学三贯清文鉴
乾隆十一年 (1746)	英华堂	一学三贯清文鉴
乾隆十一年 (1746)	藜照阁	一学三贯清文鉴
乾隆十一年 (1746)	紫竹斋	一学三贯清文鉴
乾隆十四年 (1749)	鸿远堂	翻译类编
乾隆十四年 (1749)	永魁斋	翻译类编
乾隆十四年 (1749)	文渊堂	翻译类编
乾隆十六年 (1751)	英华堂	清文汇书
乾隆十六年 (1751)	藜照阁	清文汇书
乾隆十六年 (1751)	中和堂	清文汇书
乾隆二十年 (1755)	保翠斋	四书
乾隆二十年 (1755)	三槐堂	四书
乾隆二十年 (1755)	二酉堂	四书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二酉堂	音汉清文鉴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中和堂	音汉清文鉴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藜照阁	音汉清文鉴
乾隆二十五年 (1760)	瑞锦堂	书经
乾隆	文盛堂	书经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带月楼	增补满汉篆书字汇
乾隆三十七年 (1772)	三槐堂	清汉对音字式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双峰阁	续编兼汉清文指要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双峰阁	三合便览
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富俊刻本	三合便览
乾隆五十九年 (1794)	绍衣堂	初学指南
乾隆六十年 (1795)	二槐堂	三字经注解
乾隆六十年 (1795)	三槐堂	三字经注解
乾隆六十年 (1795)	文盛堂	六部成语
乾隆六十年 (1795)	绍衣堂	清文指要
嘉庆十一年 (1806)	双峰阁	清文汇书
嘉庆十四年 (1809)	大酉堂	清文指要
嘉庆十四年 (1809)	三槐堂	清文指要
嘉庆二十年 (1815)	四合堂	清文汇书
嘉庆二十一年 (1816)	文盛堂	六部成语
道光二年 (1822)	伊兴阿	圣谕广训
道光三年 (1823)	三槐堂	吏治辑要
道光五年 (1830)	三槐堂	读史论略
道光十年 (1830)	五云堂	三合语录
道光十一年 (1831)	三槐堂	圆音正考
道光十二年 (1832)	五云堂	三字经注解
道光十二年 (1832)	三槐堂	三字经注解

道光十八年 (1838)	炳蔚堂	四书集注
道光二十年 (1840)	聚珍堂	音韵逢源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文英堂	六部成语
道光二十二年 (1842)	小酉堂	六部成语
道光二十四年 (1844)	三槐堂	六部成语
道光二十五年 (1845)	聚珍堂	小儿语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炳蔚堂	三合语录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聚珍堂	孙子兵法
道光二十八年 (1848)	自刻	合璧聊斋志异
道光二十九年 (1849)	三槐堂	读史论略
咸丰元年 (1851)	文类堂	翻译六事箴言
咸丰元年 (1851)	三槐堂	小学
咸丰元年 (1851)	聚星堂	翻译古文
咸丰元年 (1851)	槐荫山房	翻译古文
咸丰六年 (1856)	品经堂	清文启蒙
咸丰七年 (1857)	文真堂	吏治辑要
咸丰十一年 (1861)	文兴堂	十二字头
同治五年 (1866)	聚珍堂	清文接字
同治六年 (1867)	聚珍堂	清文接字
同治十三年 (1874)	北京肖氏	圣谕广训
光绪元年 (1875)	柳荫山房	清篆举隅
光绪二年 (1876)	尚友堂书坊	虚字韵 五卷
光绪二年 (1876)	隆福寺	醒世要言
光绪四年 (1878)	文渊堂	清文典要
光绪五年 (1879)	护国寺肖氏	名贤集
光绪六年 (1880)	西彩盛刻字铺	文昌帝君阴骘文

光绪七年 (1881)	聚珍堂	千字文
光绪十一年 (1885)	文宝堂	字法举一歌
光绪十三年 (1887)	聚珍堂	吏治辑要
光绪十三年 (1887)	三槐堂	吏治辑要
光绪十四年 (1888)	三槐堂	清文接字
光绪十四年 (1888)	聚珍堂	四书
光绪十五年 (1889)	聚珍堂	清语摘抄
光绪十五年 (1889)	三槐堂	清语摘抄
光绪十六年 (1890)	荆州积古斋	四书
光绪十六年 (1890)	聚珍堂	清汉对音字式
光绪十六年 (1890)	书业堂	清文补汇
光绪十六年 (1890)	聚珍堂	初学必读
光绪十六年 (1890)	三槐堂	初学必读
光绪十七年 (1891)	名德堂	清语摘抄
光绪二十年 (1894)	聚珍堂	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二酉堂	合璧聊斋志异
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北京石印馆	分类汉语入门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北京石印馆	清语摘抄
宣统元年 (1909)	镜古堂	清汉对音字式
宣统元年 (1909)	镜古堂	清文虚字指南

以下无年款

容华堂	合璧聊斋志异
宝名堂	四书
名贵堂	四书
文光堂	四书
圣经博古堂	四书

敬修堂	千字文
文萃堂	名贤集
敬修堂	名贤集
三槐堂	清文汇书
崇礼堂	十二字头
永魁斋	清文启蒙
同声堂	清文启蒙
文宝堂	清文启蒙
二酉堂	清文启蒙
聚星堂	翻译六事箴言
先月楼	满汉成语对待
听松楼	满汉成语对待
文翰斋	满汉同文杂字
宏文阁	四十条
文英堂	翻译词联诗赋
嵩祝寺天清番经局	四体合璧文鉴
嵩祝寺天清番经局	王中书劝孝八反歌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